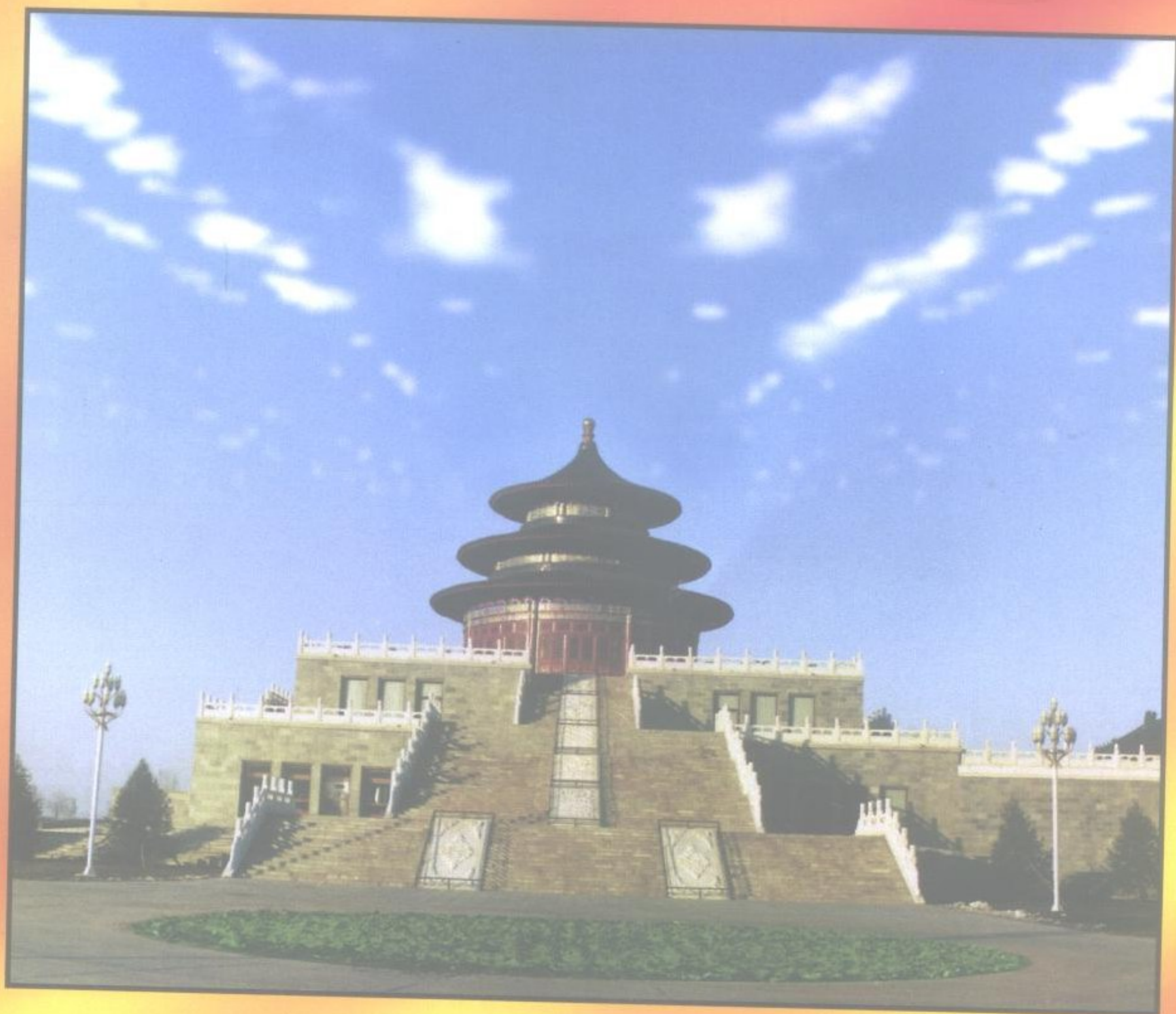


文史选刊

第 17 期



文
史
选
刊

第 17 期
1997 年 12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本期编审:

朱学民
鲁宗福
叶永清

本期编辑:

张晨声
赵 玉
王文宝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专 题 史 料

雪耻忆当年——电视资料片解说词 周庆良(2)
地图中反映的日寇侵略罪证 岳升阳(28)

回 忆 录

一件迟发的文稿 郑建山(4)

人 物 春 秋

在刘绍棠逝世的日子 郑德宽(6)

医 药 卫 生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概述 刘世恒(12)

往 事 撷 谈

老通州的习俗撷趣——婴儿诞生仪礼絮语 ... 王文续(17)

文 化 教 育

旧藏清代流传的戏剧目录 朱向如(23)

文 物 古 迹

元代通惠河上的重要津梁——土桥 周庆良(25)
谈我家族珍藏的两份救命书 刘起兴(26)
张家湾发现琉球人王大业墓碑 周庆良 马德旺(30)
李太后与永乐店的明代建筑 张永奇(31)

地 名 考 证

郝家府名称的历史探源 韩万珍(29)
大台庄与小台庄 韩万珍(11)

图 片 资 料

北京大运河俱乐部会所——回归殿 晨 声摄(封面)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回归殿
落成典礼 刘根长摄(封二)
通州举行撤县设区成立庆典 安继连摄(封三)
通州西海子公园长廊 殊 平摄(封底)

雪耻忆当年

——电视资料片解说词

周庆良

编者语：

为了迎庆香港回归，洗雪百年耻辱，政协通县文史资料委员会与通州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资料片《雪耻忆当年》。该片于1997年7月1日前两次在通州电视台播放后，受到了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称赞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爱祖国、爱家乡的生动教材。现将解说词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在京杭大运河的北端，首都北京百里长街的东端，驰名中外的古城——通州，正以光辉巨大的建设成就，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道迎接着香港的回归。

痛失香港

香港——这颗璀璨的明珠，总面积为1092平方公里。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及“新界”组成。香港岛是我们中华民族用血汗开辟出来的一块宝地，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张两千多年前秦代历史地图，雄辩地告诉我们，今日香港秦时隶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以后，历经汉、晋、隋、唐、五代、宋、元、明，直到清代道光年间，中国政府始终对香港行使主权。但是，清末有识之士绘画的这张“时局图”上，那只不远万里飞来的“老鹰”穷凶极恶地用那双罪恶的鹰爪，抓住了香港这块宝地。“英占”二字，浸透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泪！

17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图谋夺占中国土地。19世纪，英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致函外交大臣，要求从印度调军舰来华“占领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岛”，说“香港岛令人赞叹地适合于各种用途”。香港岛成为英国殖民势力蓄谋吞并的目标。1840年至1842年间和1856年至1860年间，英国借口保护英商进行鸦片贸易的所谓“利益”两次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先后签订了《南

京条约》和《北京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地区99年，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香港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就这样被血盆大口吞去了！

洗劫通州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他们虎视眈眈，猖狂北犯，于1858年5月，炮轰大沽口炮台，舍舰登陆，威逼天津。

但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保卫着自己的国家，于1858年英法联军以换约为名再次北犯时，中国军队在大沽口进行了坚决勇猛的还击，使侵略军落荒而逃！

然而，英法联军狼心依旧，于1860年8月纠集百余兵船，突然攻袭塘沽，侵入天津，步步紧逼北京。清廷恐慌，急忙调兵遣将，云集通州布防。

中国军民顽强阻击。但大清皇帝准备东逃，指挥官员畏敌如虎。清廷再次妥协求和，派钦差大臣与洋寇代表巴夏礼在通州东关东岳庙进行谈判，企图阻止洋贼入京。

然而事与愿违。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次战争是极端残暴、海盗式的侵略战争”！这群强盗自天津入犯北京，沿途数百村镇，无小无大、尽遭掳掠。位于京津之间的通州无疑逃脱不了英法联军的洗劫。

这是坐落在京津公路边的通县马头村。当年目睹者写道：“通县马头一村，千数百家毁为平地。”

英法联军“独见妇女则未有不淫，无不被掳”！大中国的传统美德竟遭这群闯入国门的禽兽践踏蹂躏！

这座四百年前修建的卫京护民的张家湾古城和入京必过的肖太后桥，都曾遭受过侵略者的践踏。

看！这是血泪的控诉：在张家湾，“妇女闻

警自尽者二千数百人”，多么骇人听闻和惨不忍睹！

在张家湾这座圣洁优美的清真寺里，数百名回、汉妇女来不及自尽，躲到礼拜殿求安拉保佑。然而“英夷大至尽行掳去，呜呼痛哉！”那高耸的琉璃宝瓶在垂泣，那苍劲的铁千古槐在呜咽！

古运河码头张家湾十分富有，当年被英贼“洗劫一空”。这是洋寇的自白！

中国军民拼死抵抗，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和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这是今天的梨园镇三间房村。法军头目帕吕在《征华记》中写道：在三间房村南至张家湾镇一带，许多尸体“被野狗、乌鸦和猪糟踏得不成样子，横七竖八地躺在高粱地、花园、溪流和树枝堆旁，炮手都躺在自己的岗位上，脚朝北京方向”。看！这是何等的残酷！

英法联军凭借先进武器入犯北京，沿途遭到中国军民重重阻击，洋鬼子们则步步屠杀而进至通州。

通州城西这座五百年前建造的八里桥，高阔的石孔，精美的护栏，十分壮观，是拱卫京师的四大桥之一，也曾是著名的通州八景——长桥映月所在地。

9月22日，中国军队于此奋勇抗击英法联军，固守长桥，寸步不让，牺牲众多，血染河水。洋寇炮弹倾泻桥上，将大多数护栏炸碎，至今尚用的几块汉白玉石栏板仍弹迹斑斑，记录着强盗的罪证！

关键时刻，清军统帅畏惧动摇而退缩，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乘机而进，直驱北京，火烧圆明园。继而，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

回 归 之 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阐明对香港问题的立场：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人民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前进，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中国人民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时刻到来了。

邓小平同志于1982年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这是当今震惊世界的号角！

“一国两制”是我们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总结后提出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伟大构想。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世界上创造的伟大奇迹。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赞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联合国秘书长盛赞此举为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解决历史争端问题的成功范例。

中英经过两年谈判，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人们从心底里欢呼：百年国耻，终于得到洗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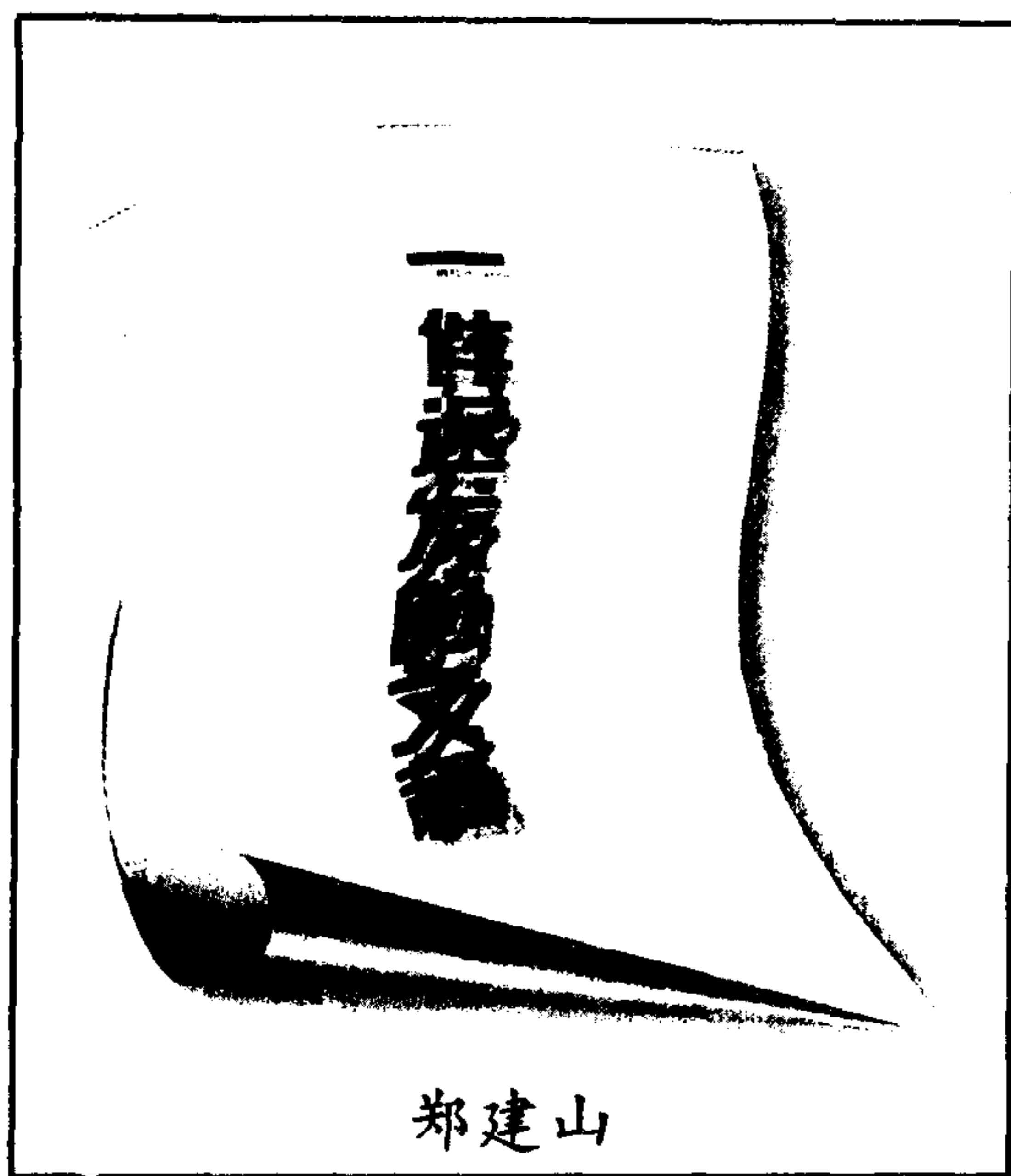
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在会见中邓小平称赞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基本法，把“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政策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下来。

根据基本法，1996年12月20日，经国务院任命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成立，她将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指导下，平稳过渡，茁壮成长。香港同胞满怀信心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巍巍的张家湾城垣，苍苍的清真寺古槐，茫茫的京塘大地，长长的八里桥护栏，在清朝晚期，目睹了中华民族惨遭外国侵略而陷入苦海仇渊！歌颂着中国人民英勇地保家卫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于今天百年耻辱洗雪之际，在庆贺之余，又谆谆告诫和教诲着人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红色的中国世世代代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周庆良 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政协通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绍棠逝世，引起家乡人极大的悲痛，文友们纷纷著文悼念他，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心中的刘绍棠》，表达了我对这位乡土文学大师的敬重和爱戴之情。然而，这次政协的同志约稿我却有些踌躇了，写什么呢？写绍棠的文学成就？绍棠老师幼年成名才华横溢，他用实践和理论构筑了自己的乡土文学大厦，12卷文集蔚为大观，何须我辈饶舌？写他对通州文学事业的贡献？翻遍文友们的纪念文章，在他们身上仿佛都有绍棠老师的心血，由我来写恐怕也不大妥当。写绍棠对家乡的热爱？“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绍棠老师对家乡的热爱，浸透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在他的行动上。我想，大运河的污染治理，通州的县改区，恐怕也凝聚着绍棠老师的心血吧！然而，这更不是笔者所能承担的。思来想去，不知如何下笔，翻阅朋友们给我的信件，翻着翻着，竟翻出绍棠老师的一件文稿，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心想：“还用我来写什么？把绍棠老师这件文稿送给区政协《文史选刊》发表，这情这景不都在其中了吗？”

这件文稿写于1989年，是绍棠老师写给《运河》的复刊词。那一年，文化馆干部调整，我到文学室任主任，文学室共3个人，我、刘祥、学晶。面对通县日渐衰落的文学活动状

况，我们很焦急，想了几条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运河》复刊。《运河》是绍棠老师倡议创办的文学刊物。说起它的命运，真是可怜，它就象通县文学活动的晴雨表。先是文学季刊，后来变成可怜巴巴的小报，接着又是文学季刊……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到了1989年，《运河》已停刊了4年。说实话，一个县如果没有文学刊物，要想把文学活动搞起来是相当难的。它是联系作者的纽带，更是培养文学幼苗的泥土。我们雄心勃勃，做了一次堂吉诃德，想先把《运河》小报办起来，然后再出文学季刊。仿佛一切都很顺利，文化馆、文化局领导大力支持，文友们热情相助，业余作者们也活跃起来，一批批稿件寄到了文化馆，我们忙得不亦乐乎，组稿，阅稿，改稿，校对，跑刊号，定印刷厂……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吧，两期很有份量的稿件组成了。《运河》复刊，应该有复刊词，我们自然想到了绍棠老师。绍棠老师与《运河》有不解之缘，《运河》创刊他写创刊词，《运河》复刊他写复刊词，《运河》反反复复，他也反反复复地写，从来没有厌烦过，而且每次都满怀激情。不过，这次确实使我有些为难了，绍棠大病在身（1988年8月5日，突发中风），行动不便，再来麻烦他，这合适吗？但大运河与刘绍棠血肉相连，《运河》复刊没有他的复刊词那还有什么味道呢？最后，我想，还是试试吧！

我是和馆长冯振光一起去绍棠家的，那天是1989年6月22日。我们敲开绍棠老师的家门，绍棠老师正坐在书桌旁，见是我们，显得有些激动，极力挣扎想站起来，我们奔了过去，握着绍棠老师的手，半年不见，绍棠老师已明显地衰老了，两鬓已生白发，但精神依旧，谈笑风声。我们问候了他的病情，谈了通县群众文学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并趁机提出了写复刊词的请求。绍棠老师听说《运河》复刊，非常高兴，连忙说：“好！好！我写！我写！”

事情就这样定了，果然，在我们回来后的第三天，绍棠老师的信和复刊词就寄过来了。望着这熟悉的字体，我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复刊词充满了他对家乡文学事业火一样的热情和希望，同时，也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他的担心：“《运河》几起几落。每一回出刊，我都非常兴奋；每一次停刊，我都十分难过。我祝愿这次复刊将不再重蹈旧辙。”

事实证明,绍棠老师担心是有理由的,谁都没有想到,一个“莫名其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运河》不但重蹈了“旧辙”,而且很“惨”,《运河》没“复”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复”就“胎死在腹中了”。望着划好的版式和编好的一摞摞稿件,我很悲哀也很愤怒,这是我们(包括作者)的希望和心血啊!难道就这样完了,不行!我得对作者有个交待,对关心《运河》的朋友们有个交待。我和刘祥四处奔走,推荐稿件,不久《北京日报》、《北京法制报》、《农民日报》、《中国农民》等报刊杂志社,稿子陆续登出来了,《北京法制报》为此还专门出了一期通州专版。

但我的心更沉重了,绍棠老师这篇稿子怎么办?这是给《运河》写的复刊词啊!我忐忑不安地来到绍棠老师的家,满脸愧疚地捧着这件复刊词,结结巴巴地说:“刘老师,《运

河》……由于经费……”我言不由衷地说出我想好的“理由”。我想绍棠老师一定会勃然大怒的,没想到绍棠老师哈哈大笑起来,他仿佛知道事情的真相似的,不但没责备,反而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呀!《运河》会复刊的,这篇稿子你留着吧!以后没准儿有用。”

我把稿子珍藏了起来。我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会让这篇稿子重见天日的。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八、九年过去了,如今,绍棠老师已经作古,这件文稿也成为他对通县文学事业的一曲绝唱。文史办公室的同志约稿,我想把它拿出来发表,这样可了却我多年的一桩心愿,并藉此来纪念这位乡土文学大师。我想,绍棠老师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我吧!

郑建山 通州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复刊词影印件

复刊词
刘绍棠

我又拿起笔,为《运河》写复刊词。
主要是由于经费原因,《运河》曾几几
落,每一回出刊,我都非常兴奋,每一次停刊
我都十分难过。我祝愿,《运河》再重
返旧辙。

我为电视文献片《话说运河》听了
讲解员中,通县是大运河的龙头,同
样,通县人丁是大运河的根子。又说,
“通县人爱脸,爱脸,好胜,不犯由,爱
复旧,明,清时代的地位,他们觉得
得祖先人。”因此,既要经济的繁荣,也
要有文化的昌盛。(通县)

通县大地,不仅要生产大量的财富,而
且要涌现大批的人才。

鲁迅先生说过,培植鲜花和大树,首先需
要的是泥土。那么,“运河”便是给通县人
才从小人的苗圃,使他从这里发芽,大树在
这里成长。

当然,“运河”也有肩负着丰富全人类文
化知识,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我希望它能力
得通村入,成为全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

粮。

今年是我的创作生活四十年,上海《新民
晚报》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写作?”请我在
该报表态。我自豪地回答道:“四十年创作
生活,我一直写自己的乡土,今后也将如此写
下去,直到最后一部作品。我要以我的全部心
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
貌,为二十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
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
采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
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
命。”

我期望《运河》的作者跟我志同道合,齐
心协力建设运河乡土文学。

1982年6月

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农历丁丑年二月初四。

早晨7点30分，我像往日一样迈进通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准备向值夜班的代表联络室科员张凤军询问昨晚和夜间有没有什么情况，有什么急事需要处理。没等我开口，凤军便向我传达了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县委办

刚才接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处鲁来顺同志的电话，告知刘绍棠同志今晨5点35分去世。我的头轰的一下，这个噩耗太突然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20天前市十届五次人代会上，绍棠老师还和通县代表团一起开会、讨论，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乐观精神，他的顽强毅力，他的坦荡胸怀，他的精辟见解，特别是他那诙谐幽默的神态还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和绍棠老师的合影前天才刚刚冲洗出来，全团合影的大幅彩照还没来得及给他送到家里，他嘱我代办的事情还没有办完……他怎么能匆匆忙忙地走了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叫凤军重复了一遍，当确认没有听错后，才强压住悲痛，赶忙思考下步工作。绍棠老师虽然不是通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但他是市代表通县代表组的成员，无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闭会期间，他和通县团代表一起开会，审议报告，讨论问题，共商全县、全市大事，和通县的市代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更重要的是，绍棠老师和通县人民，和大运河血肉相连，在他61岁的生涯中30多年生活在通县；4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全部作品都是写家乡父老和家乡风土人情。他坚持自己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独创道路，用饱蘸心血的大笔在当今文坛上开挖出一条中国特色、民族风格的“大运河”。1992年5月，通县建立

人物春秋

在刘绍棠逝世的日子里

郑德宽

了刘绍棠文库，他被家乡授予“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奖牌。他是大运河的儿子，是通县人民的骄傲，他的去世，将给通县上上下下带来无限的伤感和遗憾，将给通县代表组的每位市人大代表带来悲痛。因此，做好相应的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7点40分，我通过寻呼台将这一噩耗报告了通县人大常委会曹文广主任；7点42分，我向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红汇报这一噩耗。领导们指示，应派人立即到绍棠家进行慰问。大约7点45分，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玉辉同志通过电话指示我：绍棠去世，县委领导非常重视，你马上问清绍棠遗体现存何处，我、你、德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张德金），人大去一位副主任，代表县领导前去吊唁，慰问家属。我立即将这一指示汇报了王志红副主任，经过权衡，决定由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启同志前往吊唁。大约7点50分，我开始向有关部门询问绍棠老师遗体的安放地点。记忆中我先后问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处，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等处，接电话的人语音中带着错愕和惊诧，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一噩耗，更不要说知道遗体放在何处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接电话人甚至指责我在造谣惑众，并一再追问我的单位、姓名。但也有收获，市人大文卫体

委员会的接电话人告诉我：是他们 11 日上午为绍棠同志联系住院的，住的是北京宣武医院 8 楼，病房号记不清了。我由此推断，绍棠老师的遗体很可能停放在宣武医院。因为他是当代著名作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北京作协副主席，去世后中国作协、市领导必要前往医院吊唁，慰问家属，不可能像百姓一样去世后马上推出病房。

8 点 15 分，我拨通了 114 查号台，查询宣武医院电话，几经周折，终于拨通了绍棠老师所住综合病房的电话。值班大夫告诉我，遗体还在 8 楼 28 号病房，现在市领导正在慰问家属。我把欲前往吊唁的想法告诉了大夫，并请她给协调，等我们到后再移走遗体，她表示理解，并愿意协助，嘱我“要来马上来！”

8 点 40 分，我将查询结果汇报了王玉辉主任和王志红副主任。领导决定：马上去宣武医院吊唁。大约 9 点钟，王玉辉、朱启、张德金同志和我，一行四人从县委出发，驰往宣武医院。行前我又特别叮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邱永成同志同宣武医院再次商洽，将绍棠老师遗体暂放病房，等家乡的人到后再移走。上午 10 点钟，我们来到了宣武医院综合病房住院部，同到的还有通县文化局局长崔利民同志。由于事前已和这里打了招呼，值班大夫很快和 8 楼取得了联系，我们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宣武医院 8 楼走廊里，绍棠老师的女婿正在等候我们。在 8 楼休息室里，笼罩着一片悲哀。绍棠老师的妻子，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曾彩美女士，绍棠老师的妹妹、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女婿均沉浸在悲痛之中。绍棠老师的女婿司马南告诉我们：全家都在等候家乡来人。

作者与刘绍棠合影

他简单地向我们讲述了绍棠老师住院及逝世的经过，得知：绍棠老师是在极度劳累，导致肝病复发于 11 日上午才住进医院的，院方定于 12 日上午给其作详细检查，但还未等到天明，便辞世长眠。

王玉辉、朱启同志向曾彩美女士转达了县委书记、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等领导对家属的慰问，并一再劝慰其节哀自重。曾女士木然地对待这一切。司马南告诉我们：老人家太悲痛了，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我想，一定是这骤然降临的打击太残酷了。她不停地重复着：整整折腾了一夜，输了 4 瓶液，导不出尿来……绍棠非常痛苦，我眼前总是绍棠痛苦的样子，真是太惨了，他不断地呻吟，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了。我现在也不相信他走了，他病成那个样子，还催我们去休息，他心里只想着别人，想着工作，他太累了……医院说今天给他检查……说着泣不成声。曾女士见到我，用极悲切的声音说：“最后一次合影也没赶上，绍棠坐在座位上还说要合影呢”（指北京市十届五次人代会通县团在京丰宾馆会堂前的合影）……我的心像针扎般难受。那次合影只是毫厘之差，没想到竟导致了不可弥补的遗憾！由此我由衷地感到，绍棠老师是多么眷恋着通县代表团，

多么想和代表们在一起啊！他从1983年起，连任北京市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繁荣昌盛、为父老乡亲的富足幸福奔走呼号，诸如大运河旅游资源的开发，大运河污染的治理；关于恢复通州名称，关于通县改为通州区等，他都通过各种途径，锲而不舍地运筹、上书、协调。难怪兄弟区县的人大同志常对我说：刘绍棠真为你们通县说话！我也再次感悟到了曾女士多次说过的“绍棠对通县感情最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大运河作证，通县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我们沉浸在这深深的悲痛之中。悲痛中的时间是难熬的，但我们甘心忍受这煎熬，愿意陪曾女士及其全家人多呆一会儿，以使其心灵得到慰藉。此间，曾女士提到绍棠生前遗愿，把骨灰安葬在大运河边，以实现他“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的矢志不渝的大运河情怀。王玉辉主任当即表示同意。

10点35分，我们到28号病房祭奠绍棠老师，瞻仰这位喝运河水长大，通县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家的遗容。

绍棠老师静静地仰卧在病床上，一袭白布覆盖着全身。病床旁停放着那辆我非常熟悉的残疾人轮椅。绍棠老师的亲人轻轻地撩起白布的上端，映入我眼帘的是绍棠老师那安详的面容。他依旧穿着那身藏蓝色的中山装，黑头发中掺杂着白发，有点乱，鼻孔里塞着东西，脸庞清瘦了许多。我至今回忆不起来他戴没戴眼镜。此情此景，使我一下子想起了和绍棠老师接触的许多往事：自1993年以来，由于工作关系，在历次市县人代会上我有幸和绍棠老师频繁接触。他热情豪爽，平易可亲，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北方劳动人民

身上的固有优点。我无数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无数次听过他那爽朗的笑声，无数次推过那轮椅，无数次地托起他那伤残的腿，把那不听使唤的双脚放在踏板上……可如今，要永远地分别了，永远地听不到，看不到，做不到这一切了，我的心颤动了，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同去的王玉辉、张德金主任，崔利民局长也都眼含热泪。

我随着王玉辉主任深深地向绍棠老师三鞠躬，向这位喝大运河水长大的、由大运河养育成长起来的神童作家告别，向这位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乡土文学创作成就卓著的作家告别。

从病房出来后，王玉辉主任没有立即离开的意思。我想他一定是考虑绍棠老师此去征程遥远，要目送他走上那西行之路，心中才能得到些宽慰吧。

我默默地等待着。

10点45分，电梯停在8楼，梯门洞开。电梯工作人员守候在电梯旁，不再让别人进入。有两人在忙着接通摄像机的电源，显得动作慌乱；走廊两头均有一堆人在交头接耳，踮足观望；有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在病房进进出出；亲属们在病房里忙碌、料理。走廊里很静，很少听到说话声，有一种压抑感，让人透不过气来。

10点55分，绍棠老师的灵床在亲友们的护送下，缓缓地推出了病房。一袭白布覆盖了他的全身，一束黄色菊花放在他的胸前。亲属们已泣不成声。面对缓缓移动的灵床，我们深深地鞠躬！鞠躬！！鞠躬！！！目送着一代乡土文学宗师走向另一个世界。

从宣武医院回来后，我把情况向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12日、13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多家报纸均以“著名

作家刘绍棠逝世”为题，发了消息。

绍棠老师去世牵动着通县人民的心，一连几天，不断有电话打来，很多人向我打听绍棠老师后事办理的消息，都想在遗体告别时看一眼他们尊重的作家。由于得不到准确的消息，我的答复总使这些询问者失望。

3月17日早7点35分，绍棠老师去世的第6天，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玉辉电话指示并传达县委领导的意见，叫我和县文化局长崔利民马上进京，去绍棠老师家中询问一下后事办理情况，县里好准备相应的工作。于是我拨通了崔局长的电话，我俩商议：刘老师家里肯定人来人往，亲朋好友沉浸在悲痛中，我俩若以官方面目出现，不少事不便发问，很可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要得到准确的信息，不如到刘老师所在单位，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去打听，市文联应该是刘老师后事具体筹办单位，到那里我们可以问得更细一些。

上午9点，我们来到了市文联办公室，这里被那种特有的治丧气氛笼罩着，里间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沓子讣告和一摞印有“刘绍棠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号白色信封。几位同志抄的抄、写的写，正在为绍棠老师后事忙碌。对我们的询问，他们一一作答。我们从市作协副秘书长李青那里得知：中宣部、中国作协及北京市的领导，市文化局、市文联、市作协的领导对绍棠老师后事的办理非常重视，成立了刘绍棠同志治丧小组。我当即向市作协干部王庆泉同志要了一份治丧小组名单，打开一看，治丧小组组长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副组长是管桦、王晋、马玉田、赵金九、张淑兰。成员有李琴华、陈世崇、陈志强、陈昌本、陈建功、浩然、林斤澜、宋汎、陈模、王松声、王慎之、李青。谈论中我们得知：因为绍棠老师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外省市作协的同志

要赶来悼念他，故遗体告别仪式没能很快举行，定在3月21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市文联办公室主任陈志强同志正埋头书写讣告的信封，听说我们是绍棠老师家乡的人，马上和我们商议通县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范围。我们提出：绍棠老师是通县人，生前对通县感情最深，通县人民热爱他，都想最后看一眼绍棠老师，故通县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应该多一些。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要参加；县文化局、档案馆、潞河中学、郎府乡、儒林村的领导要参加，而且要送花圈；市作协通县的会员要参加。陈主任叫我们列一详细名单，在市文联写好讣告，带回代治丧小组发放。由于涉及到县领导参加遗体告别，我和崔局长商议要请示一下。大约在9点40分，我通过寻呼找到了王玉辉主任，请示参加遗体告别的领导范围，他大致说了个范围后明确指示四大家和四大家一把手都要送花圈，郎府乡、儒林村要送花圈。我和崔局长商议，通县想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很多，玉辉主任不可能在电话中说细，不如将讣告拿回通县再作定夺。陈主任同意我们的想法。大约10点15分，我又呼到了玉辉主任，王主任果断拍板：同意我们意见。

10点40分，市文联办陈主任领我们到市作协王庆泉同志那里去取讣告，我们提出取回100份，庆泉和我商议是否少拿些，理由是总共印了850份，通县拿走100份，剩下不够发了。我们最后拿走了80份。本着王玉辉主任的指示，我们和市文联商议送花圈的有关事宜，最后商定：通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文化局、档案馆、郎府乡、儒林村都送花圈。市作协王庆泉同志一一作了记载。我们还提出在遗体告别当日，把通县人往前安排的想法，王庆泉同志表示可以考虑。

在此期间，我们遇到了绍棠老师的儿媳，

她也是来取讣告的。我们向她转达了通县各界人士对绍棠老师身后事办理的关注。并托她转告曾彩美女士节哀自重。

中午12点30分，我们回到了通县。

下午2点，我和崔利民局长、张希正副局长到王玉辉主任处汇报并请示讣告发放的具体范围。商定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家在职和部分离退休领导由县人大办公室书写、发送讣告，其余由县文化局负责。我拿回了40份讣告。并商定由崔局长考虑绍棠老师的骨灰安葬事宜。

下午，我向人大常委会曹主任、王副主任汇报后便安排书写发送讣告事宜。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县政府县长、副县长，政协驻会主席、副主席都一一送了讣告（县委常委后改由县委办书写、发送）。部分离退休老领导，如人大常委会第八、九、十届主任，原政协主席等都发了讣告，绍棠老师就读过的潞河中学老校长方田古也接到了人大送去的讣告。40份讣告全部用完，但不断有人打电话来表示要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讣告了，怎么办，经过请示领导，决定凡有电话打来需要讣告的，答复他们都可以去，县人大备有面包车。因为绍棠老师生前是通县代表团成员，和通县组的市人大代表有特殊感情，故领导决定电话通知通县组的市人大代表，全部参加刘老师遗体告别，不再另发讣告。

20日政府办主任张德金、县委办主任王玉辉先后通知我，让我通知所有参加遗体告别的县领导午后1点15分在县委门前集合，集体乘坐县政府大面包车前去，以便治丧工作人员将绍棠老家的人往前安排，我一一作了通知。

3月21日是绍棠老师遗体告别的日子。下午1点前，10多名市人大代表便集中到人大代表联络室，互相倾诉着对刘老师的怀念之情。1点15分，由王玉辉主任召集，面包车准点出发。车上得知，不少领导为了赶时间，已从不同方向分多路出发了。大约2点30分，我们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崔利民局长早已在这里等候。为了给通县刘绍棠文库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档案局长王家明带领的摄像组已经开始工作了。我协同玉辉主任马上与治丧小组的李青同志取得了联系，将通县人员召集到黑压压的祭奠队伍最前面，默默地等候那悲痛的时刻。

初春天气冷得彻骨，风很大，告别室前、两侧悬挂的数百条挽联被风刮得飘飘荡荡、唰啦啦的响。我想起了“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猛然省悟，这风、这声是何等耳熟啊，这是大运河的风，这是大运河的悲声，这是大运河在为永远失去自己的儿子而痛哭。

告别室台阶正面及两侧摆满了花圈，各色各样的花唤起我无数联想：红的象凝固的血色；白的象征着死亡；黄的，叫你想起黄泉之路……

不断涌来的人流极有秩序地在吊唁簿上签名后，别上那寄托无限哀思的小白花，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用沉默来表达对绍棠老师的怀念之情。

我在冷风中找了许久，终于在十分显眼的地方找到了郎府乡、儒林村、潞河中学、县文化局、档案局等单位送的挽联，心中总算有了些宽慰。

离遗体告别还有一点时间，趁人们还未到齐的空当，由王玉辉主任提议，叫通县领导

和绍棠老师亲属见一面,以示慰问。在市作协李青、王庆泉同志的帮助下,县领导到第七休息室慰问了曾彩美女士及其亲属,他们已哭成了泪人。

3点,伴随着低徊哀婉、撼人心弦的哀乐声,我看到中宣部、全国人大、中国作协的领导,北京市领导,通县领导,缓缓地走向告别室,向绍棠老师作最后的诀别。

当通县县委书记李瑞和走出告别室时,我看到他用手帕在不停地擦泪。

我随着人流沉痛地走进告别室。

告别室四周摆满了花圈,有中央领导送的、有市领导送的。中国文坛若干著名作家、艺术家、生前友好若干人送了花圈。通县四大家送的花圈摆放在右侧。

绍棠老师静卧在鲜花之中,他容色安祥,香甜地睡着,脸上似乎还带有红润。他依然戴着那副我见过若干次的眼镜,头旁放着一本书。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缓缓地、轻轻地、十分不情愿地离开了绍棠老师。让他静静地睡吧,他太累了,这个文化人中的田夫野老,为乡土文学坎坷辛劳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70天,他还想着多犁两沟田,多转几遭磨,少吃草多挤奶,直至耗尽了全部心血。绍棠老师太累了!

绍棠老师离我们去了,但他在人民心中树起的丰碑永存,他的名字和大运河血肉相连。

郑德宽 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价 / 社 100

大台庄与小台庄

韩万珍

在通州城东6公里处有一聚落,名大台,属胡各庄乡辖村。其村名由来系依物而名。早在清朝初年,清廷采用汉族官僚柳寅东的建议,圈占近郊五百里内的土地,明令圈占明朝大户土地和无主荒地,实际京畿土地多被圈占。运河以东为肃王府所占有,黎姓大户首至此地为肃王府持掌,周、李二姓随后亦至,在高大土台处(汉墓)定居建村,修造王爷府,相继形成东、西两个聚落,东为黎姓等所居,名曰大台庄;西为佃户居住之地,而名小台庄。据民国三十年(1941年)《通县志要》载,大台庄简称为大台,而小台庄则已并入大台庄,属郝家府村公所管辖,1946年,大台与郝家府分离,单独建制,属胡各庄乡管辖。而小台庄逐渐被人们遗忘。

韩万珍 通州区规划局副局长级调研员,现退休。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概述

刘世恒

我是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第四期学员。1950年9月参加学习。1951年秋毕业后至1953年春留校任助教兼辅导员。1983年5月,我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人事司发来的证明函。函中叙述了原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的创办及隶属关系变化沿革、培训目的、学员待遇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等。勾起了我对那段不平凡经历的回忆。此后,我走访了几位同学,查阅了有关资料,参考了《通县卫生志》的有关部分,现将该班的历史沿革,尤其是第四期学员的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历史沿革

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是经宋庆龄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于1948年由联合国国际儿童急赈基金会与解放区救济总会联合创办的,定名为“联合国儿童急赈基金会暨解放区救济总会合办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班址在河北省正定县。美籍医学专家艾·罗爱思为联合国国际儿童急赈基金会驻该班代表。当时处于战争年代,该班由中央军委卫生部委托华北军区卫生部代管。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为中方代表,军区卫生部防疫处处长李志忠同志为驻班代办,

与艾·罗爱思共同负责训练班的全面工作,沈元晖同志为训练班主任。

1949年6月,训练班由河北省正定县本笃庄迁至通县通州镇北楼坡(今北京护士学校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训练班改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直接领导。

1950年6月,经卫生部批准,建立通县乡村卫生实验区(工作范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班部

展 示 版

围是河北省通县专员公署所辖的 13 个县),训练班并入实验区,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通县乡村卫生实验区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主任沈元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

1951 年下半年,卫生部精简机构,决定把实验区和训练班划归河北省卫生厅领导。实验区改建为通县卫生实验院,院长为白正仪同志,院址迁至新城南街 70 号,工作范围由原来的 13 个县改为通县一个县。训练班仍在原址,主任王纪钧、代主任赵石崑,隶属关系未变。

1952 年春,经河北省卫生厅批准,训练班改称河北省通县卫生学校。仍由河北省卫生厅领导。

1953 年夏,经卫生部批准,河北省通县卫生学校迁址到北京天坛。原平原省(现河南省)医科学校自汲县迁至训练班在通州镇北楼坡的原址,改建为河北省通州医士学校。至此,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的历史宣告结束。

从 1948 年 11 月至 1951 年 10 月,训练班共培训了四期学员,计 345 名。

从 1951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又先后举办了第五期班、卫生院长培训班、环境卫生班、工矿劳动卫生医士班,共培训 300 余人。

建国初期,宋庆龄、邓颖超、贺诚、苏井观、傅连璋、刘和一等领导及叶恭绍教授等先后到训练班视察。

学员来源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为乡村培养卫生工作骨干。因此,选拔学员的条件相当严格,体现了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一期学员绝大部分是从华北医科大学已学一年基础课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少数学员是投奔解放区的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助产士、护士。

从第二期起,改为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生简章,招考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学生,经过目测、口试、笔试、体检,从上千名考生中择优录取。其中,少数学员是由各省市卫生主管机关保送的。三期学员王仁德,入校前是山西省太原市卫生局清洁科科长,毕业后留校任通县卫生实验院公共卫生股股长;四期学员白清涵,1938 年参加革命工作,入校前是西北军事政治委员会卫生部护士长,毕业后任通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副科长;四期学员庞迺斌,入校前是河北省张家口专区张北县卫生科干事,毕业后回原机关工作。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的第 5 期班、卫生院长培训班、环境卫生班、工矿劳动卫生医士班的学员,都是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卫生厅选送入校学习的。

课程设置及师资状况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绝大部分是华北医大的一年级学生,他们在医大学过基础医学课,所以未设基础医学课。设置主

要课程是传染病学、细菌学、公共卫生学、环境卫生学、乡村卫生学、妇幼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外科学、急救学、政治课等 10 门课程。训练班二至五期学员因没学过医学基础知识,所以在第一期学科基础上增设了生理学、解剖学、药理学。专业课增设了流行病学、内科学、新针灸学、营养学、卫生行政课以及为女学员开的助产学课,共计 19 门。

训练班的教员大多是兼职的,都是由医学院毕业并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例如:李志中、刘世杰同志(卫生部处长职)亲自任课。外籍医学专家艾·罗爱思、马菲乐、韩明威、高尔士分别执教卫生统计学、内科学、外科学、助产学等。乡村卫生、妇幼卫生由沈元晖主任亲自任课。环境卫生学由白正仪同志(当时任潞河医院驻院代表、通县卫生实验院院长,后任保定制药厂总工程师)担任。生理学和新针灸学由王雪苔同志(当时任通县镇卫生事务所所长,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担任。此外,徐纮昌、赵鸣皋、梁国荣、王纪钧等医务界知名人士都曾担任过基础课或专业课的教员。教授政治课的是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任教的李学同志,后来调中央党校任教,并参与编写《中共党史》工作。

后来也由一至四期毕业学员中选任助教,担任一些专业课程。

第四期学员生活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第四期学员,绝大部分是在北京汇文中学考场经目测、口试、笔试、体检合格后择优录取的。还有一少部分是各地保送生。总计约 180 名。此期学员年龄、经历相差悬殊,年龄最小的 15 岁,最大的 40 多岁。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有一些人在社会上任过职务,还有少数的党政领导干部。1950 年秋,公共卫生训练班第四期全体学员集中到了通县通州镇新城南门外北楼坡入班学习。当时,正值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展开,国家的卫生事业急需农村卫生工作的

骨干。为了加速培养乡村基层卫生工作骨干,训练班像前三期一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员待遇一律是供给制,统一服装,集中食宿。那时,没有星期天,更没有寒暑假,每天上课 8 小时,自学讨论 3 小时,共 11 个小时。学员们的学习生活紧张艰苦,生动活泼,团结友爱,心情舒畅。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班部由主任、副主任、政治教员和 3 名生活干事组成,会同实验区、训练班的行政秘书、政工干部,共同管理学员的生活、学习等日常事务。全班分 8 个大组,32 个小组,每组 5 至 8 人不等,大组和小组的正副组长均由学员民主选举产生。

训练班全体学员一律享受供给制“大灶”待遇。即每月每人伙食费 8 万元(旧币,折合后来发行的人民币 8 元),生活费每月每人 3 万元,女学员每月每人增发卫生费 5 千元。冬季每人一套棉装,棉袄、棉裤和带护耳的棉帽,黑色平纹布面,白五幅棉布里,絮上很厚的新棉花,暖和又舒服。夏季每人两套灰色平纹棉布单衣,一顶灰色解放帽,都是仿军装式样。

“大灶”食堂实行民主管理,由伙食委员会领导策划。伙食委员会由实验区秘书、干部代表、学员代表、食堂管理员、会计科会计组成。食堂管理员负责日常工作,月初公布伙食帐目。虽然“大灶”伙食标准每人每月 8 万元,但办得挺好。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三餐,星期日两餐。并做到每周小改善,每月大改善。

训练班“大灶”的伙食:早餐玉米面窝头或白面馒头,玉米面粥、小米粥或大米粥;菜是腌制的小菜,咸菜丝、萝卜条、白菜、雪里蕻等。午餐是一成不变的高粱米红小豆焖饭,副食是用荤油烹制加少量肉的熬炒白菜、萝卜、土豆等大路菜,有时加豆腐、冻豆腐或粉条。晚餐与早餐大致相同,有时有点热菜。伙食小改善时多加点肉和鸡蛋,从来没吃过鸡和鱼。伙食大改善时抽调干部和学员帮厨,吃白面水饺、白面包子,馅是猪、牛肉和大白菜、萝卜、韭菜、茴香等。也常吃炖猪

肉豆腐、炸土豆块和粉条大白菜,每人一大碗。也常吃打卤面、炸酱面或芝麻酱拌面,配有萝卜丝、黄瓜丝、大蒜等。实验区和训练班是卫生单位,二百多人的“大灶”食堂,实行分餐制,副食限量排队打菜,主食不限随便吃,吃多少取多少,但绝对不准浪费。

第四期学员入学后少数住北楼坡,多数住在新城南街。男生集中在70号大院(现在门牌为9号,下同),女生多数住23号、13号院,其它11、15、17、19、25、27号院为分住的男女生宿舍。1950年冬,全体学员又集中到北楼坡,男生住南楼(现护士学校南院的一座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女生住东楼(现护士学校北院临近去复兴庄路北的一座从南看为四层从北看为三层的小楼)。这样做主要是便于管理和节约取暖开支。

训练班学员在新城南街住宿时,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然后集合出操,排队去西仓广场(现红旗机械厂对面)跑步。在北楼坡住宿时,就到学校操场整队跑步。跑步回来后漱洗,整理内务。6点至7点30分上早自习。7点30分早饭。8点至12点集中到北楼三层礼堂上大课,12点午饭。13点至17点上大课。17点至18点为文体活动时间。18点晚饭。18点30分至20点上晚自习,有时也按大组或小组组织学习讨论。20点至21点为自由活动时间。21点准时熄灯。每天晚饭前

进行晚“点名”,一般由生活干事在队前讲评,表扬好人好事,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和有关活动通知等。熄灯后生活干事还要查铺。

下乡实习

训练班第四期学员下乡实习,是依照当时通县行政区划分7个区1个镇安排的。学员分编为4个大队,8个中队。大队正副队长由实验区干部和教员担任,分片负责管理、指导中小队实习工作。学员中队分为4至6个小队,每小队4至5人,中小队的正副队长由学员担任(如一大队一中队二小队,小队长翁迺文,副小队长刘世恒,队员程雪艳、陶竞秀4人派往通县一区小堡、小潞邑、疃里等村进行实习)。实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宣传破除迷信、取缔“一贯道”和其它反动道会门的必要性;宣传卫生知识和新法接生,开展预防传染病菌苗注射(如天花、白喉类毒素等);培训农村卫生员,饮水井消毒,灭虱等工作;培训旧接生员并指导产包消毒等工作;同时也接受区公所、卫生所给予的其它工作任务。学员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饭由村长派往村中的贫雇农家中去吃,每日轮流一户。每日早中晚3餐,主食玉米面贴饼子、玉米面窝头、玉米面和玉米糝粥、蒸红薯等。副食是腌咸菜、白菜、萝卜等。伙食费标准每人每日3千元,当日付给做饭户现款。学员住所也是村长安排的。每日学员都要给房东和被派饭户挑水、扫院子,与村中贫雇农谈家常,搞调研和宣传工作。这样一来不但继承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1951年7至9月,第四期学员进入生产实习阶段。两名学员被派往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进修,目的是培养师资。一部分女学员到北京市市属医院妇产科学习助产技术。大部分学员在通县各区、镇卫生所实习。同年10月返校分配工作。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女生宿舍楼 晨 声 摄

学员去向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学员毕业后，由组织统一分配工作，除少数留校任教或留在实验区各科室工作外，绝大部分去了基层。如第一期学员除少数留校任教，剩下的分配在卫生实验区所辖范围内任卫生所所长。第四期学员毕业后留训练班、实验院各 5 人。绝大部分分配到河北省各专区、市工作。少部分分配到外省市工作。

据 1982 年有关资料统计，当时第四期学员尚有 167 人，其中男 83 人，女 84 人，多数在北京市、河北省的地、县级医疗、防疫、医学院校及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工作。其中北京市 28 人，河北省 74 人，其它省市 5 人，剩余的人尚不知准确工作地点。

另据统计，训练班一至四期毕业学员曾在通县工作并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共 36 人，其中任过县属局级领导职务的 7 人，任过县属卫生科(股)、院、所、站、校领导的 29 人。

结 束 语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她为华北地区(主要是河北、北京地区)培养了近 700 名基层卫生工作骨干，为该地区建国初期的农村卫生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党的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想当年，这些有志青年经过训练班严格培训之后，响应党的“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号召，不怕吃苦，不计名利地位，义无反顾地奔赴农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贡献宝贵的青春年华。如今，训练班学员除少数因病去世外，绝大部分已经离休退休，但他们牢记党的教导，保持晚节，发挥余热，教育后代，颐养天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鼓舞一生的训练班班歌：

第四期训练班下乡实习七中队全体同志合影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卫生战士，
我们在锻炼中成长，
我们是卫生的先锋队，
活跃在祖国每个村庄，
为祖国富强人民的健康高声歌唱，
把消灭疾病的卫生知识普遍传扬，
我们面向农村和群众在一起，
我们深入实际改造自己，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
保护劳动人民健康，
不怕苦难，
奋斗到底！

注：

1. 本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是 1982 年 8 月 9 日沈元晖、郭玉莲、王浩礼、白国云、赵石崑五同志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王伟副部长转呈崔月犁部长并党组的一个《报告》函件。这五位同志是原通县卫生实验区和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的领导。

2. 本文参考了 1992 年版《通县卫生志》。

3. 撰写此文时走访了训练班第三期学员赵金源同志(已故)，四期学员白清涵、赵锦芳、张桂兰等同志。四期学员刘宝楠也提供了大量资料。

刘世恒 通州区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督导员，
现退休。